



KANGRIZHANZHENG
ZHONGDEAIGUOJIANGLING

抗日战争中的 爱国将领

施宇 徐宏★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

抗日战争中的

爱国将领

Kang Ri Zhan Zheng Zhong De

Ai Guo Jiang Ling

施宇 徐宏 编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/施宇,徐宏编. —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5.7
ISBN 7-5073-1903-2

I. 抗… II. ①施… ②徐… III. 国民党军—将军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2709 号

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

著 者/施 宇 徐 宏

责任编辑/杨茂荣

装帧设计/正典书装

出版发行/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/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
邮 编/100017

经销热线/010—63097018 65575099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

710×980mm 1/16 25.25 印张 280 千字

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ISBN 7-5073-1903-2 定价:32.0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铁心抗日 矢志不移

- 于学忠坚持华北抗日 1

打响中国军队抗日第一枪

- 马占山江桥抗战 19

华北战场最激烈的战斗

- 卫立煌率部大战忻口 35

宁死不当俘虏

- 王甲本衡阳阻击日军以死报国 46

写出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

- 王铭章滕县战役壮烈殉国 51

牺牲在蒋帮特务屠刀下的抗日将领

- 方振武将军遇难记 57

“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”

- 冯玉祥坚持抗日矢志不移 64

“东方的隆美尔”

- 孙立人率部赴缅甸协同英军抗击日寇 85

军队的胜利就是民众的胜利

- 杜聿明率部大战昆仑关 100

率军打响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第一枪

- 何基沣卢沟桥抗战 108

以死来激励前方的抗日将士

- 李必藩成仁取义守菏泽 118

还我河山

- 李杜坚持东北抗日 123

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最大的一次胜利

- 李宗仁与台儿庄大捷 133

“战死沙场是善终”

- 李家钰血洒中原抗日战场 143

为民族生存不计较个人功罪

-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后 152

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家园

- 佟麟阁抵抗日寇血洒南苑 166

“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”

- 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180

抗日军人之魂

- 张自忠战死抗日沙场 191

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

-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207

“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”

- 张治中在两次淞沪抗战中 225

“吾若效败军之将，复何面目以对我军民”

- 张培梅以死抗议临阵脱逃 241

抗日战场尽忠报国

- 陈安宝反攻南昌为国捐躯 252
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

- 赵登禹喜峰口、南苑抗击日寇 258

誓死守土 抗战到底

- 范筑先山东抗战纪实 271

“宁死而不可降”

- 饶国华攻取广德以身报国 297

男儿贵在能死国

- 姜玉贞原平抗战壮烈殉国 301

一举打破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

- 高志航“八一四”空战显神威 309

揭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

- 傅作义绥远抗战纪实 318

英勇杀敌八百兵

-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338

誓死捍卫民族的尊严

- 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血战淞沪 360

抗日英魂羁缅甸

- 戴安澜远征缅甸以身殉国 378

- 后记** 397

铁心抗日 矢志不移

——于学忠坚持华北抗日

为阻挠于学忠抗日，日本特务和汉奸多次暗杀他。然而，这些威胁丝毫没有削弱于学忠的抗日决心，他大义凛然地说：“只要我于学忠不死，抗日是铁了心了。”

主政河北治理天津

“九一八”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，又企图占领华北，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政权，然后以华北为跳板，进而全面进攻中国，鲸吞华夏。

当时，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。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。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华北，就必须首先搞乱天津这个河北省的指挥中心。这样，天津就成了日寇占领华北的突破口和争夺焦点。“九一八”之后，为了配合日本关东军进攻辽西，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全面占领，成立伪满洲国，并为侵占华北打开通道，1931年11月8日，日寇发动了第一次“天津事变”。

事变中，王树常积极组织力量，打击日寇，惩治汉奸，及时平息了暴乱，控制了局势。但是南京政府不仅不让王树常与日寇对抗，事后还要王向日道歉，取缔反日言论，中国先撤防御工事与日本司令香椎谈判。国民党最高当局这样对待地方政府官员，使王树常不敢到租界逮捕闹事的败类，只好采取消极戒严的办法，致使天津人民行动维艰，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等约数万人生活受到影响。王树常虽然受尽挟持，苦于周旋，但天津地方人士对他并不理解，责难颇多。河北也有攻击他的空气。他硬既不能，软亦不可，左右为难，应付甚苦。

张学良对王树常是非常信赖的，王难以再干，叫谁去干？

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，毛泽东赞扬他“热诚爱国”



他当即想到了于学忠，于是便考虑让两人对调。

事前，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：“河北问题，庭五（王树常字）很难应付，你做事果决，意志坚强，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。”于学忠对张学良忠心拥戴，惟命是从，欣然同意。接着张学良电请南京政府委任。

1932年8月17日，南京政府明令发表于学忠与王树常对调。于任河北省政府主席；王任平津卫戍司令。接到命令，于学忠遂赴天津河北省政府就职。

自“九一八”事变之日起，于学忠就坚决主张抗日，对国民党不准抗日始终不以为然。他常说：“在甲午战争中，我父亲曾与日军浴血奋战，我于学忠不能辱没先人。抗倭英雄戚继光是我的同乡（山东蓬莱）前辈，我一生最佩服他的民族气节，为抗倭将一切置之度外。我从小立志向他学习。”“身为武将，第一条就是保国。”他恨透了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，为所欲为，打心眼里一直想严惩日寇。

当时，日本天津租界不仅“合法”驻有日本军队，还有一支日本豢养的武装土匪。这批土匪有2000余人，原是冀、鲁、豫地区的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，由日寇与汉奸陆续将其招募到天津，发给蓝色便服，以戴黄色袖章为标记，蛰伏在日租界的各个秘密据点内进行训练。与此同时，日轮“天潮丸”驶至天津，将一批武器运往海光寺日本兵营，发给招募来的这批人。他们不穿军装，身怀武器，为非作歹，老百姓都叫他们汉奸便衣队。被日特机关收买的失意军人李际春、张璧等，也伏居在日本租界内，由日方提供经费。李、张二人分任汉奸便衣队正副总指挥，密谋暴乱。土肥原曾对李际春封官许愿说：“只要你在河北省搞出个‘新局面’来，就由你担任河北省主席。”

日军在日租界的中原大楼、宁家桥东岳家大楼和日本花园等处，秘密修筑瞭望台和工事，监视天津情况，指挥便衣队活动。

另外，日军还暗中武装“在乡军人会”等日本、朝鲜浪人，组织所谓“义勇队”。

为了粉碎日寇搞乱天津的阴谋，打击汉奸，惩治“便衣队”，整顿天津秩序，于学忠上任后，采取了一系列坚决而又灵活的措施。外交方面，对驻津各国代表机构，一视同仁。对日本国外交事务的处理和其他各国一样，凡属从前中日正式条约所应履行的事项，一如既往，照旧履行；

而对于日方各种新要求,合理的就接受,不合理的则拒绝,绝不屈从。

于学忠断定,日本驻津军队有限,兵力不足,尚不能与我方正式发生冲突。由地痞流氓组成,并不具备军队素质的“便衣队”,不难消灭。他下令撤销了戒严令,准许市民自由活动。为了有足够的军警力量对付“便衣队”,不让他们兴风作浪,他令一一三师李振唐所部唐君尧、周福成两个团的官兵,统统改着保安队服装,轮流到市内值勤,集中警戒。如遇“便衣队”出来闹事,该打就打,该抓就抓,坚决惩处。为防日军万一动武,于学忠把自己的坚定决心郑重告诉部队:“日本人有飞机大炮,你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,怕什么?只要日本鬼子先动手,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,出了事我于学忠负责!”他严令驻在北平南苑的东北军炮七旅旅长乔方,随时做好战斗准备,一接命令,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,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,就将所有炮弹,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。绝不允许日本鬼子兵不血刃,像拿沈阳那样,用一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,白捡天津。

《辛丑条约》规定,天津有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等八国租界,八国在租界均有驻军权。美国无租界,但有驻军权。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距离外国驻军点 20 公里以外处。但为了保卫天津,随时准备策应内线,防敌突袭,于学忠命令五十一军的一一三、一一四、一一八师,分别驻扎在天津、塘沽、马厂、杨柳青一带;并在大沽构筑工事,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。

于学忠坚决抵制日寇的强硬态度和决心,使部下深受鼓舞,极大地增强了顶住日本人的信心。从此以后,日军搞戒严,东北军也搞戒严,日军搞阅兵,东北军也搞阅兵……有时隔着一条马路,敌我双方都荷枪实弹比武似地进行检阅操练。日方阅兵的马路上冷冷清清,我方阅兵的马路上却十分热闹,天津市许多工人、学生、居民围观叫好。明显看出,人民群众非常支持于部官兵与日寇进行斗争。从此,东北军抵制日寇,保卫天津的士气进一步高涨。

日本侵略者看到于学忠为保天津,有和他们力拼的信心和决心,自知利用“便衣队”闹事唾手而得天津已不可能,又不愿下大本钱重蹈在上海和十九路军硬拼消耗的覆辙,因而其狂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。日寇的暂时退让,使“便衣队”像一群无势可仗的走狗,不敢再出来闹事。从此,天津秩序有了好转。

此后不久，日本侵略者为了窥察华北的防范戒备情况和于学忠的态度，派出了由经济界、各株式会社、新闻界、军界以及其他民众团体组成的考察团、观光团到天津访问。日本现职军官和特务如田代义莪、高桥、根本、矶谷、丰多、柴山、土肥原贤二等人，都频繁来与于学忠接触。驻北平的日本代办若杉要和驻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川樾茂，也时常来和于谈话。此外，日本宪兵则不断到保安队、公安局造访、“叙旧”、“交朋友”。表面上他们有所退让，实际是以退为进；看上去“友好”、“亲善”，实际上却心怀鬼胎，暗藏杀机。面对日寇的频繁造访和层层包围，于学忠谨言慎行，机智应对，处处提防。他要求部队也要随时提高警惕，搞好战备，防止上当，防止敌人突袭。

同时，他还抓住河北省政府外交秘书陶祖椿的一项农村改革建议，准备在天津实行。

陶祖椿，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，曾在以王树常为主席的河北省政府交涉公署、津海关监督公署任职，参加接待了李顿调查团。但该调查团掌握那么多日军侵华证据，结果对日寇侵略却没起任何阻止作用，使他大失所望。事后，他不住地摇头叹息：“弱国无外交！”痛苦无奈之余，他本着“民为邦本，食为民天”，只有民富，才能国强，国富才能强兵的观念，针对天津周围农村特点（天津市郊有很多水沼，号称“七十二沽”），根据管仲“耕战一体”的思想，到天津郊区农村做了大量调查，最后提出《农村救国计划》。该计划在开辟水沼为稻田的同时，建立新的“村单位”，每个“村单位”都是一个“耕战一体”的“堡垒”。他还聘请荷兰建筑师乐伦森，按照《计划》做出“村单位”的规划模型。他上书于学忠，建议在天津周围开辟出若干个“村单位”，作为抵御日寇侵略和“蚕食政策”的基础。

于学忠看了陶祖椿的农村改革建议，非常高兴，让他广为宣传，取得支持。陶祖椿曾先后在天津“扶轮社”、“联青社”、“农社”等团体进行讲演。大家虽然反映不错，但当时华北形势危急，不具备和平建设条件，经济又很困难，为此，计划最终没能上马。但于、陶以改革顶住日寇进攻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。

于学忠到天津上任后，还遇到了一起国民党疯狂逮捕陈少敏等共产党人的大要案。在经过陈少敏等人与国民党特务的曲折斗争后，最终

都由于学忠所部释放了。

陈少敏，女，山东寿光人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中共青岛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、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和秘书长、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、中共鄂中省委书记、新四军鄂豫边区挺进支队政委、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、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。建国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、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；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共八大中央委员。

陈少敏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。由于党内“左”的路线作怪，天津市委个别人热衷于冒险行动，于1932年11月举行了全市大罢工，导致陈少敏等7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，使中共天津市各级党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。

那时，天津国民党治安力量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南京派来的国民党；一部分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兼管的警察局。凡属政治性案件，概由国民党中央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负责，发出逮捕令交给公安局执行。刑事侦察和军事防御，则由东北军负全责。警察局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矛盾很大，矛盾焦点在于“攘外安内”还是“安内攘外”。

陈少敏等人被捕后，没有送交国民党特务机关，而被暂时关押在天津市警察局的拘留所里。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都可以随时提审，但态度却各不相同。国民党特务刑讯逼供非要她承认是共产党不可；警察局并不主张刑讯逼供，局里有一位官员不相信陈少敏是共产党，竟和特务们吵起来了，问他们为什么要捉人。主要原因，一方面是陈少敏统战工作做得好，不仅与东北军一名旅长的姨太太王静宜保持了友好关系，还发展她加入了共产党，由她多方疏通，做了大量工作；另一方面是每次审讯，陈少敏都拒不承认是共产党，守口如瓶，并再三申明：自己是“东北人”，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，有家回不去，成了讨饭为生的流浪者，说日本人不好，赞成抗日，他们就把我当成共产党抓来了！还理直气壮地进行辩驳：“日本人侵占了我们东北，东北人说日本人不好，就成共产党啦！那样的话，咱们东北军不都成共产党啦！”为此，得到了警察局的理解和同情，并受到张学铭等人的保护。

尽管陈少敏拒不承认是共产党，然而，由于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局对此案看法不一，这种矛盾使陈少敏等人无法获释。为此，没有更权威的

上司和官员出面，此案无法了结。

后来，陈少敏被解送到于学忠所部五十一军军法处。

该军军法处处长为周子可。该处另有两名军法官：一位姓李的上尉军法官；另一位名叫冯子南。冯系湖北秭归人，乃周子可表弟，非常年轻，大学毕业不久。他思想进步，爱好文学艺术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具有鲜明的反蒋抗日思想，因共产党嫌疑（不知其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）曾在南京被捕，营救获释后来到北方，由周子可推荐，在五十一军军法处任中尉军法官。

据陈少敏说，五十一军军法处也对其每天进行两次提审。但被移到东北军于学忠部军法处后，由于她拒不吐实，加上东北军中一些进步军官的同情和帮助，最后终于被释放。

陈少敏在五十一军获释，究竟是谁决定的？虽然周子可、冯子南比较进步，主张抗日，但因国民党特务对此案揪住不放，周、冯不可能擅自主张放人。再则，这样一宗共产党案，移交到五十一军后，作为军长，于学忠竟然一无所知，不可思议。据对这段历史专门进行过研究的郭宝恒同志 1992 年 6 月 3 日所谈，于学忠曾潜赴牢房看过这批政治犯，并不准虐待他们，说明他不仅知道，而且寄予同情。以此推论，陈少敏等人应是得到于学忠首肯后获释的。

日寇“华北独立”阴谋破产

为了进占华北，日寇无时无刻不想和于学忠进行重兵相持的对垒、拼斗。但由于于学忠手里掌握 17 万东北军，是华北最大的实力派，日寇兵力不足，无法实现自己的奢望。他们不得不避硬就软，采取温和态度，以利诱之，企图使之为其所用。为此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智郎曾派人一次就给予送去几坛酒，进行拉拢。于学忠不在家，仆人收下了。当他回来发现后，很生气，命仆人立即送回去。

于学忠如此拒礼，日方并“不在乎”，相反劲头更大。号称“东方劳伦斯”的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等，都亲自来见于学忠，进行游说。他们要于与齐燮元等搞所谓“华北独立”，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。于是，他们指使在天津的亲日分子和失意政客张志潭、齐燮元、王克敏、王揖

唐等人，纷纷游说于学忠。

张志潭在北洋政客中素有“智多星”之称。他先跟段祺瑞，后随吴佩孚。不管皖系直系哪派当权，他都春风得意，宦海得势，左右逢源，位居要津。他先后当过段祺瑞的“国务院秘书长”、“督办参战处机要秘书”，靳云鹏的“内阁总长”、“交通总长”等。他曾极力拉拢于学忠说：日本人对你的希望，就是能像阎锡山、韩复榘那样；你如果肯那样做，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，还可以扩张势力，继承张学良的地位；军备上，所有日方在东北所接收的飞机、械弹，均可交你使用。

后来，在天津空气紧张时，张志潭也频频给于学忠来电话，有意进行游说。于对此十分反感，告知别人警告张志潭：“张文伯（张志潭字）先生以后最好对我不要谈这些啦！”

齐燮元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，投靠直系军阀，曾任江苏督军，苏、皖、赣巡阅使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，被北洋政府免职，成了失意政客；抗战时期投降日寇，先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总长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署督办和伪华北靖国军总司令；抗战胜利后被逮捕，1946年被枪决。

齐曾公开要于学忠脱离国民党中央，搞华北独立。他对于学忠说：南京政府处理华北问题诸多不当，不要听他们的。于学忠税：“我是地方官吏，个人守土有责，用不着听谁的。”当即把齐燮元顶了回去。

那时，张志潭、齐燮元、王克敏、王揖唐等人曾对于学忠轮番“轰炸”，连续游说，要他脱离南京政府，搞华北独立，当“华北王”。但于学忠立场坚定，毫不为动，使他们连连碰壁。为了摆脱其包围和纠缠，此后，于学忠对副官下达命令，拒绝接见这些人。

日本侵略者对于学忠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孙传芳（字馨远）早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时，于学忠是他的部下，驻节宜昌。于归属东北军后，孙过去的很多部下参加了东北讲武堂学习。这些人毕业后大都来到于学忠部，其中校级军官居多。

“孙馨帅，混到现在”，“血气既衰，但却不甘寂寞”。（张学良语）在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的拉拢下，孙传芳曾极力收买和煽惑旧部，兴风作浪，制造事端。他们还与过去被张学良扣押过、在山海关被撤职的旅长马廷福纠集在一起，拉拢那些因犯各种错误被撤职的旧军

官,形成一种破坏势力,妄图在于学忠部搞分裂。时驻葛沽的东北军一四师团长张冠英被其收买,加入了他们的行列,被于的部下侦知。有一天,他们在葛沽举行会议,于学忠派人前往围捕,因事机未密,走漏风声,马廷福、张冠英均行潜逃。这样,日寇勾结孙传芳的阴谋便公开暴露,孙一些旧部的破坏活动,遂以失败告终。

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伪“华北国”,在威逼利诱不成的情况下,又费尽心机寻找那些有来头的遗老们,妄图让他们东山再起,粉墨登场,作为华北的头面人物,把于学忠挤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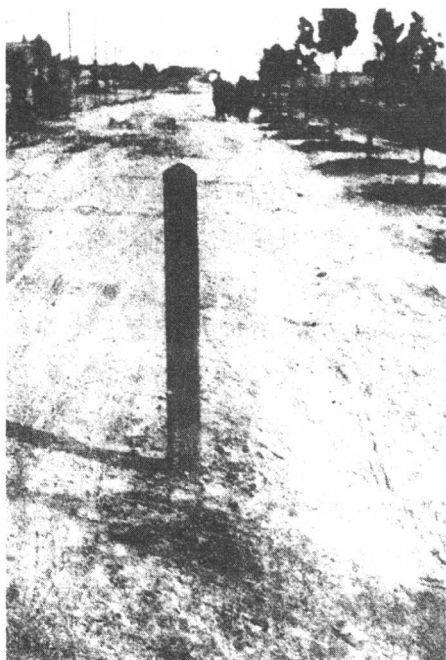
板垣首先拉拢的是蛰居天津的段祺瑞。

段祺瑞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,后留学德国学习军事。1896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,曾任江北提督等职。1912年起,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、参谋总长、国务总理。袁世凯死后,段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,任国务总理,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大权。1920年,被直系军阀曹锟、吴佩孚打下台。1924年直系政权垮台,段祺瑞又被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。后来他抵制国民会议,破坏反帝斗争,1926年屠杀北平爱国群众,造成“三一八”惨案,被驱赶下台。日本侵略者下手拉拢他的事为

蒋介石侦知,派人于1933年春将段接到上海,羁縻起来。

接着,日本侵略者又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。

吴佩孚,山东蓬莱人,清末秀才。1898年投奔聂士成武卫军当兵,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,1906年任北洋军阀曹锟的管带;辛亥革命爆发后,任第三标标统、第三师师部副官长、第六旅旅长,1915年随曹锟入川镇压护国军,1917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;1922年直奉战争后,任两湖巡阅使,直鲁豫三



在天津的日军扩大租界区,把界碑树到了我马路中央

省巡阅副使；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，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人，制造了“二七”惨案；1924年直奉战争战败，1926年被北伐军打垮，逃至四川，依附杨森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伏居北平。

日本侵略者认为，吴在政治上有号召力，曾一度为于学忠的长官，又一向反对南京政府，作为伪“华北国”的头子是很理想的。但不管日本侵略者如何花言巧语，吴佩孚“始终不为所欺”。脱离军政后，吴一向以“诸葛”自诩，不愿做外国人的帮凶。为了表明心迹，他作过一幅这样的长联：

得意时清白乃心，不纳妾，不蓄金钱，饮酒赋诗，犹是书生本色；
失败后倔强到底，不出洋，不入租界，灌园抱瓮，真个解甲归田。

董必武曾说，吴佩孚有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，他崇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关羽、岳飞等，失败后不出洋，不入租界，不蓄私产，能自全晚节，是值得称道的。吴不愿低首下心去做儿皇帝，使日寇大失所望。

此后，日本侵略者又要利用吴景濂。

吴景濂，辽宁兴城人，京师大学堂（北大前身）毕业，留学日本，外号吴大头，曾任奉天师范学堂第一任监督（即校长），奉天咨议局局长。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，1912年被张作霖赶出东北，南走广东，后来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。他积极参加护法运动，领导议员反对袁世凯。在曹锟贿选总统时，他又助曹贿选，遭到全国抨击。为了表示蕴气守节，他曾以“一死足令名不朽，千秋惟有义常申”示人。他珍视早年追随孙中山护法这段政治资本，不愿为日寇驱使，轻易自暴自弃，自我毁灭。当日本侵略者拉拢他时，他也拒绝“出山”。

日本侵略者酝酿建立伪“华北国”，在企图拉拢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吴景濂作帮凶不成的情况下，又开始利用汉奸、匪首收编匪军，在华北兴风作浪，企图把于学忠搞垮。

就在这时，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石友三，主动跳了出来。

石友三 1931 年被打垮后，逃往济南依附韩复榘。因他不甘寂寞，又怕韩有他意，乃通过与日本人素有勾结的参议陈敬斋与日寇联络，在日本特务湊开一保护下，化装成日本人，离开济南，潜赴烟台乘船从海上来到天津，住在日租界。使石友三当年全军覆没的主要敌人和核心策划者就是于学忠。所以他对于非常不满，仇隙较深。日寇正是利用石友三这一点，企图搞乱华北，把于学忠搞掉。为此，石友三拼命拉地痞流氓入伙，扩充力量，兴风作浪。

同时，日寇还利用匪首刘桂堂（混号刘黑七）捣乱。

刘桂堂 1915 年潜入山中为匪，后率匪众流窜于鲁南山区。1928 年投靠蒋介石，其匪众编为新四师，刘任师长；1930 年投靠阎锡山，任二十六军军长；1933 年春去东北投靠日伪成为“皇协军”，任伪满第三路军总指挥；1934 年 2 月，回山东被韩复榘击败后，只身逃往天津，潜居在日租界。不久，在日寇支持下重新出山，在宣化招兵买马，搜罗匪徒，为日寇充当打手，大肆在华北骚扰，疯狂与于学忠作对。

为了保卫平、津，保卫华北，于学忠一方面顽强地对付日本侵略者，一方面针对石友三、刘桂堂便衣队的破坏活动，不断组织力量予以惩治。只要他们的活动一经发现，就会立即遭到于部的无情打击。他们的骚扰尽管给冀东老百姓造成了危害，但在于部的“严打”下，始终未能真正在冀东和天津形成大的气候，也没有使于部在华北的实力受到影响和削弱，更未动摇于学忠在华北的地位和作用。

“他们滚出中国我才高兴呢！”

1934 年 4 月 17 日，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霸亚洲的《天羽声明》，4 月 22 日，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博，在接受《华盛顿星报》记者采访时所发表的谈话，比《天羽声明》更为露骨。他说：“日本政府较世界任何他国更其理解中国；中国目前之纷乱状态是一种对日本的直接威胁。”“日本之所要求的是，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商人订立任何重要契约时，务必于事前商诸日本。如外国商人漠视此种要求，则中国政府不能不负忽视我国警告之责任。譬如中国新近购买之飞机，成为意图于最后以之对付日本者，所以日本终久不能容忍此类事情……”“任

何对华援助，日本认为其适足以助长中国内乱、或为对日本作战之准备，日本必须予以制止。”日本不仅要作中国的太上皇，还要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。

那时，日方迭次造谣，谓我方将对它不利。在天津海光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，装设地雷，并敷设铁丝网麻袋等物，加强防御工事，俨若战争状态。沿北宁铁路附近，亦均加强戒备。按《辛丑条约》规定，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不得超过 200 人，而日寇竟以换防为名，不断增兵。他们采取的手法是，接防者已到，撤离者不走，无形中成倍的增加了兵力。日方在铁路沿线，均用此法增兵。

驻津日军则加紧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。日本特务机关唆使日本士兵骑着马，在华界横冲直闯，肆意侮辱行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耀武扬威地故意路经省政府门口，并在省府附近架枪休息 10 分钟。此种做法，向例未有，显有示威之意。

面对日寇挑衅，于学忠一面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，一面命令部队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。

日寇在天津增兵挑衅的同时，在华北一带也利用一些与政府毫无关系的民事案件，制造事端，故意整于学忠。

5 月 14 日，日本青年小岛助一在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，孤身一人，擅自到丰润县第三区韩家寺日本人本静次郎开设的三东洋行访友，碰上三名匪徒抢劫该行，将小岛助一掠去，于 15 日将其杀死。这一案件，是日本浪人在该地毒打农民惹起公愤后发生的，纯属民间所为，中方事前一点消息也不知道。按照惯例，中国官方可予赔偿或口头表示遗憾。但日方却就此事大造声势，使事态迅速扩大。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智郎，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五项要求：

- (1) 由河北省主席向日本驻屯军司令正式道歉；
- (2) 惩办唐山公安局长及县长；
- (3) 赔偿一万元；

平津两地的“日本国防妇人会”组织在华的日本妇女在车站欢迎日军

